

经学浮沉中的文体变迁

两汉解经文体研究

Stylistic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lassics:
Research on Interpretation Style of the Han Dynasty

唐元 著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疏云一名負嬰大小疏草蟲三章章七句至自防也

長短如蝗而青也

疏曰作草蟲詩者言大夫妻能以

自防也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

則憂不常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則憂不常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疏云今人謂蝗子

之異種同類猶男女燕萃水不水疏

不疏云今人謂蝗子

反阜音婦蟲音終李巡

未見

煩種宜舅反

婦人雖適人

歸宗之義箋云未見君

不與不自命也在余而憂憂不

仲救中反當

亦既見止止我止我止我心則降

下也箋云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

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

男女觀精萬物化生

法地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遷起

躍而從之者阜蟲也以興以礼求女

妻也此阜蟲乃待草蟲鳴而後從之

之妻必待大夫呼已而後從之與俱

去也既已隨從君子

子無以等父母之齊故懷心衝衝然

亦既見君子與之同

鳳凰出版社

经学浮沉中的文体变迁

两汉解经文体研究

Stylistic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lassics:
Research on Interpretation Style of the Han Dynasty

唐元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经学浮沉中的文体变迁：两汉解经文体研究 / 唐元
著.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506-2299-9

I. ①经… II. ①唐… III. ①经学—文体—研究—中
国—汉代 IV. ①Z126.273.4②H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2950号

- | | |
|---------|---|
| 书 名 | 经学浮沉中的文体变迁——两汉解经文体研究 |
| 著 者 | 唐 元 |
| 责 任 编 辑 | 林日波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s.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湖南路1号,邮编:210009 |
| 开 本 | 880×1240毫米 1/32 |
| 印 张 | 11.75 |
| 字 数 | 327千字 |
| 版 次 |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299-9 |
| 定 价 | 59.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83657308) |

摘 要

经学是两汉学术的主流,解经也是汉代重要的著作形态。六经及其早期的解经文献中,就已经存在文体因素,两汉学术的发展历程中,体现出鲜明的文体营建、流变过程,许多解经文体都是在两汉定型或萌生的。

两汉解经文体类型众多,归纳而言,以论、传、记、序、章句五体得到最普遍的使用。论说体讲论义理,传体转受原文,记体以杂录为特征,序体解读相次之义,章句体分章析句,细密解经。这五种文体,在两汉解经中使用广泛,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和价值,是进行经学研究、文学研究和文体学研究时,应该着力考察的对象。

解经的诸文体是在具体的解经工作中逐渐形成的,在两汉经学史上,许多学者通过自己的解经文本对解经文体发展做出了有价值的运用和创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论说体文章解读《春秋》义理。韩婴对《诗经》的解读著作,表明了解经传体的内、外传之分。《毛诗故训传》是训诂与传体的结合。司马迁的《史记》以经典为来源构建史籍的体例,尤其是对解经传文体进行改造而形成史传体,成为重要的文章形态。宣帝之后,章句体伴随着经学家法的确立而定型,它形成了汉代官学的文献形态。扬雄试图以拟经的体式来解经,这是一种独特而充满争议的尝试。经过了西汉之交经学复古与革新的趋向,到了东汉,解经文体进一步整合。章句体弊端凸显,开始转型。《白虎通义》和郑玄、许慎等为代表的五经总义类著作,用论说解经文体对解经方法作出了突破。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为本是《春秋》解经文本的《公羊传》再作解读,保留

2 经学浮沉中的文体变迁

了公羊学说的主体特色,又体现出学术融合的时代主流和自身的个性因子。他与郑玄之间的往来论辩,也为经学论说的体例与作用,做出了有益的贡献。郑玄集汉代经学之大成,不仅是遍注群经,他在解经文体上也具有继往开来的地位。尤当注重的,是创立“笺”体对《毛诗》做出表明与识别;写作《诗谱》补大、小《序》之不足;注《周礼》为集解之体开先声。

而且,人们对文章的认识,对文体的探索,也在两汉解经文体的发展史上得到了广泛的实践,结出累累硕果,这对后世的经学和文学等领域中的一切文章样式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序

唐元博士的专著即将付梓,值此可喜可贺之际,作为她的写作过程的见证人和第一个读者,我想发表点个人的看法。

这部专著是唐元的博士论文,题为《两汉解经文体研究》。这个选题意义非常重要。中国古代的经学源远流长。自从产生了经典,就出现了对经典的传授和阐释,在解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体式各异的解经文本。先秦的《易传》、《礼记》即为儒家解经之作,儒家以外的《墨子》、《韩非子》等书中,也有一些解经的成分。到了汉代,经学昌盛,儒家经典得到全面阐释,各种解经文本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汉代的解经直接继承了先秦儒家代表的周代礼乐文化传统。礼乐文化重文,崇尚古代的文化和典籍,以文化典籍培养温文尔雅的君子人格,在典籍的理解和阐释方面,强调罕譬而喻和举一反三。孔子以述而不作的原则在阐释经典中表达新见,同时又倡导兴发感悟式的用诗方式,是这种文化传统的赓续。同时,汉代经典阐释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经学视儒家经典为最高真理,通过阐释其微言大义,为政治教化服务,一些学者甚至把经典当作“谏书”,通过阐释经典来批评朝政。因此,经典阐释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传承与研究,而是借解经以阐发新意,构建思想理论体系的文化创造行为,是用以干预现实的政治实践的工具。汉代文学和史学的发展,为经典阐释注入了审美意识和历史观念,阐释者视作品为个人情感和时代生活的记录,以知人论世的方式在个人情志与政教意义的契合点上阐发文献之旨意。长期以来,人们把以训诂为主、学风朴实视为汉代经学的特色。实际上,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在传统与时代风尚的共同影响下,汉代经典阐释有重视阐发义理,发挥主观理解的特点,阐释者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这又使汉代经典阐释具备了文学价

值,对它的研究,理应受到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经学有自己特殊的阐释方式,进而形成不同的解经文体。汉代的某些解经文体在发展过程中渐渐脱了解经而独立,成为重要的散文体裁。其中“序”、“传”和“记”对文体发展的影响尤为重要。序是早期儒家解经最常用的形式。受其影响,司马迁作《太史公自序》,序的前半部分自叙身世及《史记》的创作宗旨,后半部分逐一解说各篇作品之旨,其形式酷似《诗经》的大、小《序》。不过,司马迁在序中充满感情地表达了继承孔子作《春秋》,发愤著书的抱负和决心,这又是一般的解经之序所不具备的内容。《太史公自序》是由解经之序向表达个人情志之作过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班固在《汉书》中也仿照此种形式,于结尾列《自序传》一篇。汉代其他学者或整理典籍,或自著新书,也往往作序一篇以交代相关问题。例如许慎的《说文解字序》、高诱的《淮南子序》等。序又被用于单篇作品之前,汉代的赋、颂、诔、铭等各体作品之前往往有序,有些序的长度甚至超过作品本身,作者在序中围绕写作背景和作品主旨,进行议论、抒情或叙事,序逐渐脱离了经典阐释而成为一种散文文体。汉代以后,序文逐渐脱离为之作序的作品而独立存在,发展出宴游序、赠序等文学性更强的文章。由此可见经典阐释与文体发展的重要关系。传和记也是汉代最通行的解经文体。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中批评当时的儒者“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可见传记在经学传授中的重要地位。传是对经的说解,受这种解经形式启发,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列传之体。刘知几在《史通·列传》中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这种看法符合司马迁创立列传之本意。司马迁认为,《春秋》之传是以事实来解经的。他论及《春秋》和《左传》的关系时说:孔子作《春秋》,“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受此影响,司马迁把《史记》中记载人物事迹的文章称作传,用来说明和补充本纪的编年体记事,其作用正如同

以传解经。经过司马迁创造性的发展,传由解经之体成为古代散文中的重要体裁。记是解经者纂录的与经典相关的各种资料。《汉书·艺文志》著录关于礼的记百三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后学所记也。”流传于今的则有所谓《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这些记或偏于记叙,或偏于论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受其影响,汉代在解经之外也出现了以记为名的作品,例如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和蔡邕的《车驾上原陵记》。这两篇作品都已脱离了解经,但仍和记载礼仪有关,可以看出它们与《礼记》的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记完全摆脱了对经典的从属地位,出现了更多的和解经无关的作品,例如记载怪异之事的《搜神记》、《拾遗记》,记载寺庙的《洛阳伽蓝记》,记载风俗的《荆楚岁时记》等,到了唐代,以记为名的单篇作品不断出现,记在古代散文文体中逐渐成为泱泱大国。由上述例子不难看出经典阐释在文体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这些解经文体,不仅有助于了解汉代经典阐释的方式和特色,而且又可以推动古代散文文体的研究。因此,对解经文体的研究应当给予充分重视。

唐元博士早在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对汉代的解经文体产生了兴趣。她的硕士论文即以章句为研究对象,其博士论文进而把研究范围扩充到汉代全部解经文体。可以说,这部专著是她在这一领域多年探索的成果。全书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总论汉代经学的概况及各种解经文体,第二部分以时代为序,详论汉代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解经著作。书中对与汉代经典阐释相关的各种问题,都作了颇为详尽的探讨,既总结了各种解经文体的基本特征,又探讨了汉代解经文体发展过程。通过这些探讨,唐元表达了对汉代经典阐释的独到心得,创获颇多。例如关于董仲舒《春秋繁露》一书的性质,历代学者或认为它是解释《春秋》之作,或认为它是独立的理论著述。唐元经过认真考察,并把它和解释《春秋》的另一部著作《公羊传》加以比较,认为它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解经之作。她指出:“董仲舒治公羊学,而他的解经方法与《公羊传》不同。《公羊传》多问答语,颇有师徒讲经授受之象,此种写法受到家法传承的影响。而董子之《春秋繁露》多论断语,体现出的是一个独立的

作者的精思,与诸子之论说相类。《公羊传》以传体成文,《春秋繁露》以论体成文。这种文体上的差异,也是影响到他们的著作呈现不同的面貌的决定性原因之一。”“《春秋繁露》以论说成体,它的论点主要围绕《春秋》的义理与书写方式。在这些论点上的静思明辨,是《春秋繁露》的论说文字能够达到杰出成就的重要条件。”传和论是汉代解经的两种重要文体,唐元通过对《公羊传》和《春秋繁露》的比较,不仅肯定了《春秋繁露》是一部解经之作,而且揭示了传和论两种解经文体的区别。在这些论述中,显露出她对研究对象的深刻理解。

研究生的论文往往体现出青年学子创新的冲动和敏锐的思辨,但有时也难免为了标新立异而失于严谨。透过本书蓬勃的文思和流畅的文笔,我们能够感受到唐元强烈的创新欲望,但与这种创新欲望相联系的,则是严谨细致、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每当探讨一个重要问题,她总是穷尽式地列举各种相关的观点,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详细考察,分析各家之说的优劣短长,在此基础上,或独抒己见,或择善而从,一切均从实际出发,绝不故作新奇之论。她对《韩诗》内、外传的文体辨析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关于《韩诗》内、外传的性质及特征,前人说法不一,或认为内传早已亡佚,而外传只是引《诗》以证史,并非解《诗》之作;或认为内、外传皆存于今本《韩诗外传》之内,二者都是解《诗》之作,至于二者解《诗》方式的差异,清代陈澧作了较为深入的论析。他以《韩非子·解老》篇和《喻老》篇为比照,认为《喻老》篇是引古事以明之,即外传之体,而《解老》篇即是内传之体。对此,唐元并未急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她先考察了古人著书分为内外传的具体情况,然后对陈澧的说法作了分析。在详细对照了陈澧提到的《韩非子》相关原文之后,她指出:“从《韩非子·解老》篇和《喻老》篇同为解读《老子》第五十四章的段落,即可以看出它们在解读《老子》本文时的明显差异:《解老》篇以讲论式的文字,将《老子》本文的义旨进行转受,这与儒生们对儒家五经的传文在语体上是一致的。而《喻老》篇则是以古人古事与《老子》的某一处原文的义理相触发,它也包括讲论式的文字,但特别突出的特点是征引史事,亦以‘故曰’引出《老子》原文,却并不一定随着《老子》原文的顺序而列,而是

随意的。从以解释的文字来转受《老子》义旨这一点上,《解老》篇和《喻老》篇都是解释《老子》的传文,但是从具体的行文方式来看,它们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可看作是《内传》与《外传》的两种不同的传文写法。”在此基础上,唐元以今本《韩诗外传》的前三章为例,分析其解《诗》特点:“第一、三章,是典型的外传文体,用史事来与原典阐发,第二章,并不是典型的外传文体,没有古人史事,而是直接解读原典。第一、三章这种体式,是《韩诗外传》的主体,第二章这种体式,在《韩诗外传》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这可以看做外传著作虽然以史事阐发为核心的文体特征,但它也杂糅着内传的体式为辅助。也可以认为,《韩诗外传》可能确实是内、外《传》的混合,故而在不同的章节中分别具有内、外《传》各自的文体特征。《韩诗外传》对《诗经》的解读,较之内传毕竟是又拉远了一些距离,加之解释《诗经》,本就有断章取义、《诗》无达诂这样的观点,所以,它所引述的史事与《诗经》本文的关联,常常显得有些随意、有些牵强。”至此,关于《韩诗外传》的性质,关于内、外传的关系及其解诗的文体特征都讲得一清二楚。这里看上去是在辨析前人的学术见解,实际上作者个人的真知灼见就包含在这深入的辨析和细密的表述之中。这种寓作于述的表达方式,体现了作者朴实而严谨的学术风格。

唐元读硕士研究生时是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的高足,她那时即开始关注汉代的解经文体,学有专攻。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师大攻博,开始全面研究汉代解经文体。她治学勤勉,思力敏捷,很快在同济中脱颖而出。论文开题时,她的选题和前期成果深受好评,被遴选为优秀博士论文的资助对象。经过两年的努力,她的博士论文圆满完成答辩,又经过三年多的沉淀和修订,论文终于面世了。作为她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起点,此书的出版是非常值得祝贺的。相信她从这里出发,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宽广的学术道路,我在此期待着她有更多的新成果问世。

努力吧,唐君。

尚学峰

2015年元月于京北龙泽

目 录

序	1
概论	1
总论	6
一 解经文体的理论基础	6
(一) 六艺之文	6
(二) 后经典时代解经的兴起	9
(三) 作者与述者的身份定位	13
(四) 解经的方法与目的	17
(五) 解经的文体意识与文体意义	20
二 六经及其早期传记中的解经文体因素	26
(一) 《易》之经传合体	28
(二) 《诗》之训诂体单行与章句特性	35
(三) 《礼》之记体特点与传胜于经的传授	36
(四) 《春秋》三传解经体式的差异	43
三 两汉解经文体辨析	56
(一)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解经著作文体概要	57
(二) 后汉解经著作文体概要	80
(三) 论、传、记、序、章句等主要的解经文体	88

分论	113
一 西汉解经文体的变迁	113
(一) 西汉经学兴起与解经文体的继承与创制	113
(二) 《春秋繁露》的论说解经文体	119
(三) 《韩诗》内、外传文体之辨	129
(四) 《毛诗故训传》训、诂与传的合体	138
(五) 刘安《离骚传》的公案	151
(六) 司马迁《史记》对解经“传”文体的改造	157
(七) 宣帝之后经学家法与解经文体的定型	176
(八) 章句作为官方解经体式的确立	183
(九) 扬雄以拟经为解经的体式	196
(十) 刘向、歆父子与经学革新的趋向	205
二 东汉解经文体的变迁	225
(一) 章句体的弊病与转型	231
(二) 《白虎通义》与经学论说	240
(三) 徐防《五经宜为章句疏》恢复章句的观点	252
(四) 许慎、郑玄的五经总义类著作	258
(五) 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体例特色	276
(六) 何休与郑玄之间的经学论辩	287
(七) 郑玄“笺”体辨正	292
(八) 郑玄《诗谱》的文体意义	309
(九) 郑玄对集解体的突破	316
(十) 解经之变与玄学之兴	329
结语	340
馀论:后经典时代的往昔与后传记时代的困惑	342
参考书目	354
后记	363

概 论

解经,就是注解经典,特指儒家经典。这种工作,可以叫做注解、注释、解释、诠释,而“解经”这一称谓,最可以突出它的经学本位。

文体,就是文章的体式。^① 儒家经典是不是文章?六艺分明彪炳文脉,“诗三百”分明万世诗歌之祖;但是经书中又确实有不少的部分,少文采之斑斓,略文气之转承。解经文字是不是文章?众多传记分明成文,众多文章分明解经;但注解终究依托经典,多为琐碎、分割,至有朱子“注解不可成文”之诫。经学与文学划然分途,然而经学与文学又难以割裂,其发展之历程,非为平行之双线,而为纠结之互动共进,为寻其中之关捩,辨体一途,不可或缺。

后人看待两汉学术,多以今、古文二者分途。两汉皇朝中,除却新莽时期,自今文博士家学成为官方学术形态之后,它就一直据有官学地位。此一脉,经世而致用,守家法而立章句,以公羊学为基点,又杂以阴阳谶纬,是典型的官方化、政府化、学院化的统一性意识形态。而古学一脉,起于民间而兴于民间,至新莽而短暂得到“官方”的推崇。虽王莽政权很快失败,古文学之势却已大张,随后东汉一朝更是名家辈出,实为东汉一朝学术之隐性主流。古文学标博览而尚文献,力图破除官学门户之见及章句繁琐之弊病。贾、马、许、郑诸大家于礼制、训诂、音韵、考据等后世学术之诸领域与方法有大突破与大建树,而以郑玄总其成,遍注群经为天下法,至此今、古文之主导地位彻底一变,并在后世基本

①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观》:“文体,指文学的体制、式样,也就是我们现代所说的文学种类、文学体裁。”《褚斌杰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页。

保持。

汉代学术之开创,在其义理,亦在其体例。义理方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行经国之业,立家法之传;体例方面,或继承,或完善,或创制了多种多样的经学文体,在经学著作中,体现出了鲜明的文体和义例观念。义理与体例,加之清儒汉学一脉所最为推崇的训诂、考据层面,共同构成了汉代经学的内部面相。再加之经学与时代和社会的各方面所天然具备的紧密联系而形成的外部面相,这内部与外部的丰富性与纵深性,使得汉代经学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学术主潮。它在很多方面直接影响了随后中国学术的蓬勃发展,可以说,后世的各个学术流派,乃各得汉代学术之一面而发扬光大。^①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体,此一时代文体与一时代之精神关联甚深。而每一时代之代表性精神,并非一独立的、突然的存在,必有其继承之传统,有其思想内核为其支撑。此一内核,乃一民族之长久积淀,会有隐蔽衰微之时,而不会彻底消亡,待一时代精神与时代文体酝酿成熟,则此一时代之人群,即在此精神与文体中安身立命,找到皈依与创造之坦途。而解经,不仅仅是解释经典而已,是儒生对世界、人生、自然、社会及现实的政治与内在的思想等众多看法的融汇,所以解经方式的变迁正体现着历代学人思想与历代思潮之导向的变迁。

中国文学之衍生与经学有莫大关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刘勰《文心雕龙》以原道、宗经、征圣始,其实是大多数中国文人的一个共识。经学到底在哪些方面衍生了文学?是经学的哪些性质衍生了文学?儒生与文人这两种身份高度重合的中国经学传统与文学传统,又是怎样互相影响的两条线?经学与文学的结合处,到底表现出了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又是什么样的内在规律和外部影响在怎样发生作用?这是一个充满着问题又充满着乐趣的值得探索的谜团。

从“文体”——这个经学与文学共同具有的面相来切入,可以破除

^① 此节可参照本人论文《汉代汉学与清代汉学之辨》,《九江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28—31页。张静对此论文亦有贡献。

经学与文学的二元截然划分方法,重视解经文体和一切经学文体的复杂性,一探交杂在一起的中国经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究竟。

两汉作为经学的时代,对其经学的审视可从多个向度展开,而解经文献作为经学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是经学发展中最具有能动性与时代表性的方面。六经之体各异,注经之体亦纷繁。先秦两汉解经文体众多,如《汉书·艺文志》之“六艺略”所载之书目,即有传、训、说、章句、记、故、议、奏、微、纪、语等诸体,或以一体名篇,如《欧阳章句》;或以诸体联用,如《毛诗故训传》;又有不以通行之文体命名,而另取名者,如《公羊董仲舒治狱》。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①此“体”,应不仅有六经,亦不仅有狭义之文学文体,众多解经之文体,对后世的文体发展也影响深远。及至汉代,各家学说著诸竹帛,各文体亦逐渐定型。待刘向校书,马班著史,学者薪传,先秦两汉的各家传注,走过了一条充满着传承,又充满着散佚的道路。及至今日,两汉经籍注本,或全本流传至今,或仅可辑佚而窥,或仅存书名而一字不传。而如刘知几《史通·补注》所言,“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邪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于《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攀虞所衷之《流别》,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61页。

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欲加商榷,其流实繁”,^①两汉每一位经学家对解经文体匠心独运之处,皆是经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关键点。“体”的观念,在我国历代学者文人的著作观念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解经文本中还容纳着多种治学的方法。并且两汉儒生解经注释的行为并非是对方法的沉溺。两汉经学注释,不仅是一项技艺,也是一门学问,还是一股时代发展中的重要力量。此种现象,正如陈寅恪在《突厥通考序》中所言:“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②

两汉解经诸体,学人已多言,然尚多迷离之处。盖其中的众多体式,纷繁复杂,相互勾连,总结之时,易作加法,见一处则加一处,导致各体之异同相混。故亦当作减法,减至各体之最核心特征,乃有更鲜明之界定。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体之变与时代相随,若不将解经文体之发展与时代变迁相结合,则此种文体终究是僵化的、板滞的、定格的。赋予文体发展以时代的脉搏,即是赋予文体本身以生命、以活力,才能进入它们活跃的时代,接近它们的本真。

从现在的学科分类来看,作为我国古典学术主流的经学,可谓是一个跨界的学科。在文史哲等许多方面对经学展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并且正在更加蓬勃地发展。而在解经的研究方面,发展得最充分的,是引进了西方的阐释学思想和方法之后,用之于中国的经学阐释研究。由于以伽达默尔的学说为核心的西方阐释学以哲学为本位,所以受之影响而产生的中国阐释学也是以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和突出。

而在文体学的研究上,我们同样受到了西方非常发达的文体学理论的很大影响,加之中国古典学术理论中本就有的精深的文体意识,中

① 刘知几《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② 陈寅恪《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3页。

国文体学的学科建设,已然蔚为大国,多年来文体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但遗憾的是,经学著作中的文体现象,并未在文体研究中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同时,阐释学的研究也比较局限于哲学和方法的层面,而与文学、文体隔着一层。这就形成了对阐释学中的文学因素和文体学中的阐释因素有所忽略的状况。

因此,可以说,对经学阐释文体的研究,是在经学的本位上,充分结合阐释学和文体学的研究方法,所进行的综合研究。也可以说,是在经学与文学的研究之间,筑起一座由“文体”——这个双方都具备的因素所构成的桥梁。

学界对中国经学阐释学的“哲学阐释学”层面已经比较重视,并且从方法的层面上,也已经对中国的阐释学有了值得肯定的研究成果,但对它的“文学阐释学”层面还没有足够清晰的认知,还没有从经学与文学的交界处打开研究解经文体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的足够广阔的空间。本著作即要从此一层面展开。中国的经学阐释学,不仅应有自身的哲理,亦应有自身的体制。一方面,经学与文学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儒生在解经时确实是有自己的语体、风格、体裁,具备了形成文体的一切要素。而且后世的很多“文学”作品,其实也是在解经。我们研究中国的经学与文学,不能不认可,亦不能不重视其中的文章、文本、文体(及其各组成因素)的“跨界”现象。